

论中国传统史学双轨发展格局的形成

乔治忠 孔永红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西周末期,中国的传统史学产生于官方制度化地记录史事,至战国时期私修史勃兴,编纂水平超过官方。历经秦与西汉,官方史学呈现衰微和停滞,而司马迁的《史记》则是私修史的巨大跨越,而且有将史学发展拉向突出个性精神、离开先秦以来传统路径的倾向。但东汉明帝支持班固撰修《汉书》的同时,倡修《东观汉记》,开创官方不仅记史而且修史的局面,将史学重新拖回依附朝廷政治的方向。东汉对私修史引导而不堵塞,构建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双轨发展的新格局,这奠定了传统史学的基础,促成中国古代史学的繁荣,其历史文化魅力,导致后来少数民族政权的仿从,成为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最重要的先导因素,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史学双轨发展;官方史学;私家史学;新格局

作者简介:乔治忠(1949—),男,天津人,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孔永红(1985—),男,河南正阳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2)03-0150-08 收稿日期:2012-04-10

中国传统史学的繁荣兴盛,其重要原因是中国具有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这两条互动、互补又互相排抑的发展轨道。而形成组织化、制度化并且连续发展的官方史学,是中国传统史学区别于西方古代史学的显著特点,官方和私家作为两种不同性质的史学活动主体,视野、价值观、利益诉求不可能完全一致,而处于不断的矛盾与磨合之中,交织出多彩的史学景观,演绎着丰富的规范与理念。因此,欲深入研究中国史学史,就有必要考察史学双轨发展格局的形成过程和运行机制。

一、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于官方

一个上古民族,是否能够产生原发性的历史学,实为或然性,而即使产生史学,其形式和途径也非一定。这从世界各地上古文明的对照和中西史学的比较即可看出:第一,文明发达很早的

古埃及,仅存丰富史料并未产生本民族原发的史学,原因是古埃及缺乏自觉记史意识与强劲的记事求真理念。史学产生的社会条件,需要发明文字和具有相当程度的历法,需要大事件的激发,更需要一定社会背景下产生强劲的记事求真意识。第二,西方史学的产生,可以从古希腊说起,“希腊人是史学创始人,正如他们也是科学和哲学的创始人那样。欧洲的史学无须向更古的时代追溯了”^{[1]31},其标志性成果是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约前425)撰著的《历史》(又称《希腊波斯战争史》)一书。因此,西方史学实际是从私家撰史诞生的。

然而中国史学乃是从官方产生,这是与古希腊完全不同的途径。在西周武王伐纣之后,统治者面对殷商“顽民”的反抗,总结殷商灭亡的原因,同时思考如何建立稳固的统治秩序,形成“殷鉴”

的理念,《诗经·大雅·荡》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尚书·召诰》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就是要将夏、商兴亡的历史引为借鉴。这是中国上古思想文化的巨大飞跃,真正的理性思维由此而起步。殷商时期,还弥漫着浓重的蒙昧迷信观念,殷墟的卜辞则反映出凡事皆须仰求上帝以定然否,似乎一切皆由冥冥中的神秘力量所决定。凡事均须占卜,说明社会意识在整体上并不具备真正进行理性思维的条件,文化和认识的发展还停滞于直觉、感性、经验、想象的水平,对于气候、星象、历法所取得的知识,均未超越观察、经验和想象的范围。但“殷鉴”的观念不同,这是要追究以往政权兴亡成败的原因,化作自身行政的参考,包含对因果关系深度的逻辑推理,打开理性思维的新天地。因此,“殷鉴”观念是中国上古理性思维的第一线曙光,撕开禁锢思维发展的迷信罗网,天命与人事关系的新认识,“敬德”、“保民”等政治思想,都由“殷鉴”观念即历史的思考而导出。

中国上古理性思维从“殷鉴”的历史思考开始,给传统文化注入格外重视历史经验的基因,意义深远,也迈出中国史学产生之漫长进程的第一步。“殷鉴”这种历史意识,必然导致对历史遗留文献的重视,同时也会注意保存本政权的官方文书。在现存的《逸周书》《尚书》之中,即有不少西周早期形成和整编过的文献,如《尚书》的《盘庚》篇,应是殷商时期文献而经过西周的整编和补订,《康诰》《酒诰》《召诰》《多士》《洛诰》等篇虽不免有后世掺杂、窜乱之迹,但基本可以确认为西周文献。^[2]¹⁹⁸⁻²⁰²《逸周书》之《世俘》《克殷》等多篇,也可定为周初之作。^[3]¹²⁹⁹这里还需说明:西周统治者并非简单地将政府公文作为档案保存,而是经过编辑整理,在一定范围内传布,否则就没有必要将《盘庚》等篇予以较大的加工修订。史籍《国语》虽在战国时期成书,但它记载的是春秋时期人物的言论,其中颇有引述《夏书》《商书》《周书》者,在《论语·为政》中也记载了孔子曾引用《尚书》,说明《尚书》于春秋时期或之前就已经在各诸侯国流传。对国家公文书编辑、整理的举措,当然主要出于政治需要,但与单纯的留存不同,已经包含朦胧的史学意识,是向史学的产生又跨近了一步。

经过编辑、整理的《尚书》等典籍,是一种历史文献的汇集,成为很贴近于史学的史料,但只

要未能将公文文献的内容连同政治背景、前缘后果等系统地表述出来,就还是不能算作史学诞生的标志。很明显,从官方公文文献的整编蜕化为系统性的历史叙述,进而演化为持续发展的史学,存在着难以穿越的瓶颈,中国史学的产生仍需要走另一途径,即主动记载史事的方式。主动地记载史事,无论中外皆早已有之,希罗多德之前,古埃及、古希腊政权以及其他政权,就已经出现碑铭、泥版或其他方式的史事记录,在中国,甲骨文也颇有记事内容,商末周初的金文,多为记载一件荣耀的事件。但这些文字史料尚不能视为史学,只有时间明晰、连续性、制度化的史事记载,才具备史学产生的品格,以及趋于严谨、日益丰富的发展前景。

中国于何时产生这种连续性的历史记载,尚缺乏直接的记载,但依靠间接的资料,也能作出大致的推断。白寿彝先生认为:“《墨子·明鬼》为证成己说,列举各书。于宗周晚年以后之事,引周、齐、宋、燕之《春秋》,而以所引宣王杀杜伯一事为最早。在此以前,不是引某国《春秋》,而是引《尚书》和《大雅》。《国语》记周事,以穆王征犬戎一事为最早,然记事同时又记年者却始于宣王。这两事似可提供一些迹象,说明编年体国史的出现于周宣王或其前不久的时期。”^[4]¹²¹⁰白先生举出的史料,表示中国至迟在周宣王时有了《春秋》这种连续性编年记事的史籍,而不能排除更早的可能性。周宣王之父周厉王之时发生了“国人暴动”,厉王被驱逐,西周进入一个特殊的“共和行政”时期,中国具有准确和连续的纪年,即从“共和行政”的公元前841年开始。

需要追问的是:这公元前841年的准确连续性纪年书是怎样产生的?众所周知,中国虽然很早就掌握了较好的记日和记月的方法,但纪年方法长期存在着很大缺陷,周代长期沿用殷商时期“唯王”若干祀(年)的纪年方式,而对于在位君王又缺乏明确的称谓,致使今存不少青铜彝器,其铭文即使纪年,但所属哪一周王,仍难以判定。在历法的这一缺陷制约下,形成确无争议年代谱系的最可能的方式,是按时间顺序连续性地记载时事,公元前841年之后的连续纪年,是否缘于官方连续性的史事记载呢?现尚未找出明确的证据,但逻辑上是成立的,因为“国人暴动”、国王被逐,随之出现没有国王参与的“共和行政”,都是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足以刺激记述历史的

可能。“共和行政”无论实际是周公、召公联合执政，抑或共伯和执政，执政者都深知这只是权宜的过渡时期，连续记载时事以防日后的追究，自然是可能产生的举措。合乎逻辑的估测不等于实证，仅为今后的考订提供思路。但从国人暴动直至“宣王中兴”，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变动促成连续记载史事制度的形成，而且不得不如实记述这些负面的史实，这种推论则大体上无误。总之，在西周末期，已经出现连续性的官方记录史事的体制，标志着中国独具特色的史学从官方产生。

《国语》记载楚国史官倚相的叙述，指出卫国卫武公时，已经“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①。卫武公约在周宣王十六年（公元前812）即位，至周平王十四年（公元前757）去世，跨过西周末到春秋初，他在位时期实行“史不失书”，应当是自西周末期开始，仿从周天子体制，坚持到晚年。对于春秋时期史学状况的这类记载虽然零星、简略，但蕴含着丰富的内容：第一，卫武公时“史不失书”，进一步提供了西周晚期形成编年体历史记载体制的佐证；第二，“史不失书”，反映出记录历史乃为连续的、制度化的，曹刿向鲁国君主进谏时曾说：“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②表明记史制度是遵循“君举必书”与讲究一定书法的规则，从曹刿语意上看，这已经实行许久了；第三，至迟在春秋初期，记史体制已经扩展到诸侯国，连地处较为偏僻的秦国也于周平王十八年（公元前753）初有史以纪事^③，可见记录史事，已成为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普遍举措；第四，历史记载既然用来“以训御之”，那就允许君主观看和闻知，在上层统治者范围内是公开的，晋悼公时叔向“习于春秋”，被认为可以做到“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④，也反映了历史记录并非仅留存档，而是研讨总结，用于政治。《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史官董狐于史册书“赵盾弑其君”，赵盾为此向董狐辩解，孔子赞扬他“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⑤；同书，襄公二十五年载齐国事：“……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则当时记载史事的规则，亦不向被贬斥的当事人隐瞒，而不顾忌权臣的报复。

总之，西周末期产生、春秋初期扩展的官方连续性记录史事的体制，是中国史学已然形成的标志。虽记载内容很简略，但成为制度化、组织化的举措，史事记载中又以“书法”等方式表达善

恶褒贬，不能看成简单的史料汇集。更重要的是，中国记史、讲史与政治结合在一起，使史学行为加入到政治运行机制中，对社会文化的整体取向产生重大影响，强化了史学持续发展的基础。

二、私家史学的勃兴与超越

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辉煌发展的兴盛时期，众多学派兴起，百家争鸣是其重要特征；而伴随百家争鸣的进行，私家著述也大量产生，此为先前没有的文化现象。春秋时期，即使儒学创始人孔子，也未曾撰著个人的著述，这主要不是因为其文化程度和能力的限制，乃是整个社会与时代并未形成私人撰著的需要。所谓孙武撰《孙子兵法》，乃是缘于传说的不可靠记述，“孔子作《春秋》”的说法也缺乏实据且疑点重重，皆不足为训。但到了战国时期，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学派蜂起，相互争论，诸子百家为扩大社会影响、压倒异说，产生了撰辑著述的需要；而为了学派传承的广远，也不能单凭口耳相传，需要付诸文籍。这样，私家著述的涌现成为必然的趋势。诸子的论说各自汇集为书，一些传说、故事和实用知识编纂成型，私家的历史撰述也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产生。不少私家著述实际并非一人所作，如《墨子》《庄子》之中，既有本人之文，也汇入后学撰述，《管子》更是多种学派文献的杂编，学士将一些论说和撰述归属于本学派或某学派的创始人，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常例。

在战国的百家争鸣中，儒家是孔子所创立的学派，既比其他各家渊源较长，又热衷于招生授学而徒众亦多，其内部支派分立，理念参差，学术深浅不一，可谓处于“杂儒”泛泛的状态。但秉承孔子“信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⑥的遗训，儒家比其他学派更重视历史、重视历史文献，则为共同的特点。在私家撰述风生水起的背景下，不能像孟子、荀子等自成一子的许多儒学士人，不仅编辑、整理、解释《诗》《书》《易》《礼》等文献，而且编撰了《左氏春秋》、《国语》等史籍。《左氏春秋》和《国语》，是战国时期私家撰史的代表作。《左氏春秋》后称《左传》，其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学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我们认为著名先秦史学家徐中舒的说法比较可信，要点是：《左氏春秋》起先乃贵族盲人左丘明开始讲说

《左氏春秋》即《左传》之原名，至汉代才改称为《左传》，以表示此乃解释《春秋》之书。

的历史故事,由盲人讲史者继承,口耳相传。至战国时期由孔子后学的子夏支派在魏国写定,但仍以最先讲述人左丘明为作者。撰写中将鲁《春秋》作为时间、事件的参照,因而与之颇有联系但又又有内容出入,其立意并非解说《春秋》。据书中对魏、秦等列国军政态势预言的应验与否,可判定成书年代在公元前375—前351年之间。^[9]

和其他学派一样,儒家对《易经》等古文献的解释出现大量托名孔子的言论,《孟子》《荀子》《左氏春秋》和《国语》也引述所谓孔子之言,甚至不遑顾及是否与孔子的真实思想、风格相一致。不仅如此,儒家学派还放出孔子删定《诗》《书》,注释《礼》《易》及孔子作《春秋》的舆论,将之揽入儒学体系。战国百家多有本学派的撰述,但只有儒家抢占这些“元典”性古文献,并奉为经典,因而文化根基雄厚,为后来成为统治地位思想准备了条件。不过在战国时期,很少有著述明言“五经”的删定、注释和修订是出于孔子之手的。如《左传》中说:“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7]成公十四年这里有些闪烁其辞。后来孟子则径直地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0]《滕文公下》,这不能信以为真,只反映儒家学派存有讲古文献归属于孔子的愿望并且制造了流言,只有在言论上多所夸张失实的《孟子》,才将“孔子作《春秋》”形诸文字。即使晚于孟子的荀子,虽将《春秋》置于经典之列,但亦未曾明言孔子修订过《春秋》。由此可见,中国私家修史的兴起,应在战国时期。

以《国语》《左氏春秋》为代表的私家史学,在撰著水平上已经超过官方史学,但官方除了保持按时间顺序记录史事的体制之外,也有个别的新进展,即魏国有官修的《竹书纪年》。此书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内容起自传说的黄帝,按时间顺序记事,直至当代,至春秋时记事以晋国为中心,三家分晋后专述魏国史事其内容的这一特点,加之记事如同《春秋》那样的简略,深藏不传而不被世人所知,等等,都显示了当时的官修史性质。《竹书纪年》展现了官方不仅记录当时史事,而且做出撰述通史的尝试,其历史观念也不同于儒学思想,是值得注意的史学现象。但这种尝试在各国没有得到推广,没有在官方史学活动中传承,其书也未能在于世间传播,被随葬于魏襄王墓,淹没近600年之久,到西晋时才得以出

土。《竹书纪年》在什么背景下编纂?为何密不传人乃至被埋葬?这是史学史上一个蹊跷的不解之谜。

战国的私家修史虽超过官方记录史事的水平,但在史学思想上却沿袭官方以史鉴戒、以史教化、以史辅政的观念,至战国后期赵孝成王(公元前265—前244年在位)时的虞卿,失官后“不得意,乃著书,上采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以刺讥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6]卷76《平原君虞卿列传》。这无疑属于私修史,但仍贯彻与官方史学一样的政治宗旨。秦与汉初,无论饱含史论的《吕氏春秋》,抑或陆贾的《楚汉春秋》,大致如此。待西汉司马迁《史记》的出现,私修史实现了一个巨大的跨越。

司马迁的《史记》纵览今古,内容宏富,开创了史书纪传体通史的编纂方式,这是世界史学史上独一无二的成就。但这部私修史的著述宗旨是什么?则值得探讨。司马迁自称其书“亦欲以究天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1]卷62《司马迁传》,其中“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撰史的根本宗旨,前两项都是实现成一家之言的方式和手段。早在司马谈临逝遗嘱令司马迁撰史之际,目的就包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6]卷130《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申明:他受宫刑而“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司马迁将“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髡脚,兵法修列”^[11]卷62《司马迁传》等事例作为鼓舞,在受刑之后发奋著书,认为受到打击和挫折,有时却正好成为著书立说的动力。在司马迁看来,所有历史人物,都应当是以留芳名于后世为人生目标,“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6]卷61《伯夷列传》。整部《史记》评论历史人物,也都贯彻了这一标准。

本来其父司马谈嘱令撰史,含有记载汉朝大一统功德以及“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事迹的意旨,司马迁在与壶遂的对话中,也表达了“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6]卷130《太史公自序》的责任感,这其实是要以撰史来歌颂汉朝。然而受刑之后,态度已经改变,在《报任安书》中不仅绝口不提撰史的任何政治意图、社会责任,而且

史学界也有认为《竹书纪年》为史官私修史的说法,理由是它曾作为随葬品。但这个理由不能成立,至唐朝皇帝崩逝,仍有以官修实录随葬事,见《新唐书·吴兢传》。

对任安要求司马迁为朝廷“推贤进士”的提议,予以拒绝:“无乃与仆之私指谬乎!”依照这里显露的心态,可知司马迁撰写《史记》,只剩下留名后世的“私指”,为此“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11〕}卷62《司马迁传》!司马迁的《史记》,实际是将“殷鉴”观念为根基的史学意识拉向一旁,离开原来的轨道,另辟一条发展路线。其特点是并不理会先秦以来以史辅政、以史教化、惩恶劝善等社会功用,并无为当前政治提供鉴戒的意旨,独立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褒贬人物、评论史事,显示个人的见识与文采,毫不顾及统治者的喜好或厌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6〕}卷130《太史公自序》。撰史在司马迁心中,最终是自我的、个性的事业,体现出个人“扬名于后世”的终极目标,这是一种反传统价值观的觉醒。《史记》以其杰出的编纂方式和生动的文笔,以及通贯古今、包举天下的宏博内容,取得史学史上不可抹杀的突出地位。但古代中国的历史文化积淀与集权政治的环境,不可能让《史记》的撰著宗旨成为主流的文化意识,古代史学不过历经了一个迂回,最终仍然返回到传统价值观导引的方向。

三、官修《东观汉记》与史学发展新格局

《史记》取得辉煌的史学成就,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面世之后,立即引起广泛注意,许多学者接续撰写,私家史学的发展远远超越了官方,西汉自司马迁之后,官方史学几乎看不到任何起色。但是,在《史记》成就被肯定的同时,也泛起批判其思想倾向的声浪,西汉末年,扬雄就曾指责《史记》述史“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12〕}卷一,而东汉初续写《史记》的班彪,则批评司马迁“薄五经”、“轻仁义”、“贱守节”等等,“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13〕}卷70上《班彪传》,用语可谓十分尖刻。因此,司马迁所开辟的史家个性发展的路径,在私家学者中就遇到反制,而官方也随之作出相应的史学举措。

班彪之子班固承袭其父的撰史成就和史学思想,并且作出重要的改变,即决定将西汉的历史断代成书,摈弃了接续《史记》的撰述模式。班固认为:司马迁不仅在历史观点上“其是非颇谬于圣人”^{〔11〕}卷62《司马迁传》,而且那种通史的写法也是把汉朝“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同样有不敬之嫌,于是“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

书》”^{〔11〕}卷100《叙传下》,以“尊汉”为出发点,遵循“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11〕}卷100《叙传上》的准则。但《汉书》还在撰写中就被诬告,这导致史学上的一个重大变化,《后汉书·班彪附班固传》记载说:

……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班)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

班固因祸得福,汉明帝任其为兰台令史,因而获得编撰《汉书》的更好条件。但重要的是他同时被任命纂修《世祖本纪》,这实际就是《汉记》纂修的开始,后来撰有列传、载记多篇,均为其书的组成部分。《汉记》是东汉官方修撰的纪传体本朝史,编纂历程延续至东汉末年,因东汉后来藏书机构改在“东观”,修史工作也在此处,故该书被称为《东观汉记》。班固是第一批参与纂修《东观汉记》的官员,而开展此项修史活动的决策者乃汉明帝。据《后汉书》卷二《显宗孝明帝纪》记载,汉明帝“十岁能通《春秋》”,后又“学通《尚书》”,具有相当的史学造诣。他对《史记》的思想倾向很不满意,后曾公开对文臣宣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14〕}而阅读了班固《汉书》文稿,则十分赞赏,在对不同的私修史既有厌烦、也有赏识的感受下,受《汉书》体例和宗旨的启示,遂决计由官方纂修当朝的纪传体国史,将史学拖向依附于朝廷政治的路径。

《东观汉记》的纂修在东汉是间断性地修纂,即积累一段时期后,由皇帝或其他执政者提议,再接续编撰。根据前引班固事略,可知于汉明帝时纂修伊始,就创立且编撰了“载记”,说明当时已经作出体例的全面规划。此后,汉安帝至顺帝、汉桓帝至灵帝两大段时期也取得重要进展。汉安帝时邓太后重视文史典籍,她亲自部署纂修《东观汉记》事宜,先后几次令文官刘珍、刘騊駼、刘毅、李尤等人撰述名臣、节士、儒林、外戚等传以及史表,整理修订本纪。汉顺帝时,多名文官接续这些纂修工作,撰成“诸王”、“王子”、“功臣”等传、《南单于传》《西羌传》以及《恩泽表》《地理

志》等等。这样,加上最初班固纂修之时就具备的本纪、载记,《东观汉记》之五种构成体式,即纪、表、志、列传、载记,都有了成文之作,为今后进一步的撰述奠定了基础。

据刘知幾《史通·古今正史》记述,汉桓帝时《东观汉记》的撰成篇目大增,还修成《百官表》,书稿达到114篇。汉灵帝时期,统治根基动摇,东汉已成末世,而纂修国史,却颇有起色,原因是一些有识官员并学者,看到国势衰弱,因而更有撰史的紧迫感,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均为参与纂修的官员,此时史稿已经达到143卷以上的规模,其中蔡邕对此情有独钟,他在体例上有自己的见解,因故被判罪流徙之后,仍然致志于撰史,撰四十多篇纪、传之外,还完成“十意”即十篇志,并将成稿都进献给朝廷。

在中国官方史学的发展中,记史与修史大有区别,记史是当时记录下来,作为一种资料保存起来,修史要修成一个成品的历史著作,使之得以传世。《东观汉记》的编纂,是官方纂修本朝断代国史的创举性尝试,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晋时以此书与《史记》《汉书》为‘三史’,人多习之”^{① 15} 卷50史部别类《东观汉记》提要,地位重要且影响广泛。其中资料,成为后来编纂后汉历史者的主要依据,唐代之后,才渐渐散佚,但其宝贵的史料价值和广泛官方修史的示范作用,不可忽视。有了这种官方修史活动和修史意识,不仅带动了官方记史体制的建设,也对私家修史产生很大的激发作用,中国史学的发展因此而进入新的阶段。

自汉明帝倡导官修史书之时,官方从未试图废止私家史学,班固一人既私修《汉书》又参修《东观汉记》,表明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可以并存互济。汉顺帝时,应奉“删《史记》《汉书》及《汉记》三百六十余年,自汉兴至其时,凡十七卷,名曰《汉事》”^{① 13} 卷48《应奉传》唐李贤注,即应奉所撰《汉事》,利用了官修的《东观汉记》。另有侯瑾“徙入山中,覃思著述……又案《汉记》撰中兴以后行事,为《皇德传》三十篇,行于世”^{① 13} 卷80下《文苑列传·侯瑾传》,即根据《东观汉记》撰写了《汉皇德传》一书。侯瑾并非朝廷官员,也能参阅《东观汉记》,取材著书,可见私家修史借助于官方史学业绩,在《东观汉记》纂修进程中即已肇始。东汉政权包容私家史学,但要求政治观点和史学思想与官方基本一致,汉和帝时,郎中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① 13} 卷48《杨终传》,这样大肆删去五分之四篇幅,

当然已然尽除朝廷不喜欢的内容。允许私家撰史利用官方的资源,诱导私家撰史迎合官方意旨,官方还可以委任私家独自完成官方需要的修史事项,是东汉朝廷的基本文化政策之一,这构建了官、私史学互动的新格局。

官方与私家史学的互动关系,在东汉末年促成中国史学史的又一名著,即荀悦的《汉记》。建安三年(198),汉献帝“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诏尚书给笔札”^{① 13} 卷92《荀淑传附荀悦》,荀悦自己撰写的《汉纪序》记述其事更详:“诏给事中、秘书监荀悦,抄撰《汉书》,略举其要,假以不直,尚书给纸笔,虎贲给事吏。悦于是约集旧书,撮序表志,总为帝纪。”^{① 16} 这里显示出《汉纪》虽为私修史,却在官方的大力支持下完成,荀悦自觉地在撰史中体现了上层统治者的根本利益,这不仅付诸实践,而且归纳出比较系统的理论表述。

荀悦论述说:“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这样撰写史书,即达到“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备矣”^{① 17} 卷1《高祖纪一》。“达道义”是指史籍要通达儒学思想体系的根本原则;“彰法式”是要史籍彰明国家纲纪与符合纲纪的制度,重点是突出记述正面的内容;“通古今”是史籍要讲明社会历史演进的源流;“著功勋”、“表贤能”是指史籍对国家有功勋、品德高、能力强的人物应当记载和表彰。关于史学的社会功能,荀悦有十分经典的论述:“君举必记,臧否成败,无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异,咸在载籍。或欲显而不得,或欲隐而名章,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赏罚,以辅法教。”^{① 18} 卷2《时事》在谈到自撰《汉纪》时,自称“瘁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兹亦有国之常训,典籍之渊林”^{① 16}。这里,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个性精神已被摈弃,《史记》以及《汉书》所记载大量人物、事迹,都不在“五志”之内,“以嗣赏罚,以辅法教”的宗旨,令史学成为王朝政治的附庸,这种理念得到历代统治者的赞扬。荀悦的史学理论与实践,标志在官、私史学互动的新格局下,完成了古代传统史学基础的奠定。

《隋书·经籍志》著录《东观汉记》143卷,则东汉末年撰就的史稿一定多于这个篇幅。

战国时虽有编年体通史《竹书纪年》,但在其存世之际影响就狭小,且早已湮没而不为人知。

四、史学双轨发展格局的重大意义

东汉建立的传统史学双轨发展格局,对此后的社会文化、民族关系都产生很大影响,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

第一,挽救秦朝、西汉官方史学的衰退局面,使之复兴。如前所述,中国古代史学从官方产生,但战国时期私家史学已经发展到超过官方的水平。秦始皇在武力统一全国的进程中,灭裂六国历史载籍,而秦国的历史记载又很不健全,司马迁曾慨叹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6〕}卷15《六国年表序》西汉官方虽然在儒学经典的恢复和促进文学发展上均有不少建树,但史学作为甚寡,西汉朝廷有记事性“注记”(又称“著纪”),现存资料却见不到朝廷对这种记史体制的描述,说明记史制度已经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因为秦火,战国时期东方六国的官方史学状况难于考知,但《竹书纪年》能够表明已比春秋时期有所进展,而秦与西汉的官方史学,反不及战国时期。东汉对《东观汉记》的撰修,抵消了司马迁另一史学途径的影响,扭转了官方史学停滞、衰颓的局面,不仅修成一部影响很大的纪传体史籍,而且带动了记史体制的发展。东汉坚持了“汉之旧典,世有注记”^{〔13〕}卷10《皇后纪第十上·邓皇后纪》的记史方式,还创造了宫内“起居注”的载籍形式,启示了西晋以后的记史制度的建设。此后,官方史学的发展和繁荣,就是在东汉的基础上再度兴起的。东汉不仅是汉朝的“中兴”,同时也是官方史学的“中兴”。

第二,东汉将官方与私家史学的关系,进行了成功的整合,构建了史学发展的新格局,这是中国传统史学得以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官方的记史制度虽在春秋时期即已扩展到各个诸侯国,但编年记事的载籍乃藏于宫廷,并不传播。至战国时期私修史兴起,虽然官方一些“语”类、“书”类、“谱牒”类文献,可能有所流布,但编年史记依然封闭,连《竹书纪年》之书也如法秘存,直至随葬而少人知晓。可见当时官方史学与私家记载之间,尚未构成充分互动的社会结构,致使史学发展持续性的链条存有脆弱的一面,秦朝与西汉官方史学的衰微,即是这种脆弱面的反映。

东汉朝廷开始官修《东观汉记》,但并不禁止

私修史,对私家史学引导而不堵塞。如汉明帝虽厌恶司马迁的“贬损当世”,但没有采取查禁举措。前文提到应奉所撰《汉事》、侯瑾所撰《汉皇德传》,都是包含东汉当代内容的私修史,都得到朝廷的认可。当局发展官方史学也容许私家修史,是官、私史学能够良性互动的基本条件。《东观汉记》还在撰修进程之中,其内容已经有所传布,使私家修史者得以参考,如前所述,《汉事》《汉皇德传》等书都直接利用了《东观汉记》的资料,这是十分开明的做法,是官、私史学互动新格局的良好开端。此后经魏晋南北朝的继续发展,确立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相互联系的发展轨道,这给史学以充沛的发展空间和活力,导致中国古代史学的兴盛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与国家。

第三,官方不仅记史,而且修史(即指纂修传世的成品史著),对于周边民族政权以及域外政权具有特别的文化魅力,促成其学习和模仿。原因十分明显,一个政权若将自己的功业予以记载,许多上层人物可以青史留名,这是官方史学最明显的功能。西晋衰亡,北方呈现多种民族政权的代兴局面,史称“十六国”。而“十六国”则多数都开展了官方的记史、修史活动。例如,匈奴族刘渊、刘聪政权,有“公师或以太中大夫领左国史,撰其国君臣纪传”^{〔19〕}卷11《史官建置》,羯族石勒的后赵政权,“擢拜太学生五人为佐著作郎,录述时事”^{〔20〕}卷105《石勒载记下》,鲜卑族后燕慕容垂政权,“董统受诏草创‘后书’,著本纪并佐命功臣王公列传,合三十卷”^{〔19〕}卷12《古今正史》。这是传统史学扩展到少数民族政权的崭新景象。北魏政权创业之初,就着手修史,明言“史阙其职,篇籍不著,每惧斯事之坠焉”^{〔21〕}卷35《崔浩传》,即恐怕自己的功业湮灭不闻于后世。虽然传统史学在少数民族政权内发生一些大的冲突,但总的方向是记史的实录理念与统治当局的政治利益之间,通过磨合找出一个互为牵制的中和点,使史学的求真准则与政治功用的矛盾化为非对抗性,这在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内都是古代史学发展的通例,传统史学具有适应于古代社会各族的兼容性能。

更重要的是,少数民族政权由于仿从汉人政权的官方史学活动,从而对传统史学蕴含的历史观念逐步认同,向慕传统史学记载的源远流长的帝王统绪,从而将自己的祖先衔接于黄帝以来的历史统绪上,如鲜卑族慕容氏、拓跋氏都自称是黄帝之后裔,匈奴族的赫连勃勃自称夏后氏之苗

裔,国号为大夏,鲜卑宇文氏自称炎帝神农氏之后,其政权命名为“周”,诸如此类,几乎所有少数民族政权均采用历史上已有过的国号,如“燕”、“赵”、“秦”、“汉”、“齐”等。这种历史文化的认同,成为该时期民族大融合的最先导、最稳定的促进因素,北方民族各政权内皆有明显的“汉化”,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乃为最突出的典型。东晋、十

六国、北朝这一历史阶段,是汉族和汉族政权相对弱势的时期,但是恰恰这一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开始了记史、修史的官方史学活动,从而在汉人政权弱势的形势下确立了汉文化的主导地位,推动了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大融合。由此可知,东汉时期官方史学的勃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发挥了多么重大、深远的潜在影响。

参考文献

- [1] [美] J.W. 汤普森. 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 [2] 张西堂. 尚书引论 [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58.
- [3] 郭沫若.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G] //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 [4] 白寿彝. 中国史学史(第一册)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 [5] 国语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6] 司马迁. 史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7] 孔颖达. 春秋左传正义 [G] // 阮元. 十三经注疏.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8] 论语 [G] //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9] 徐中舒. 《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 [J]. 历史教学, 1962, (11).
- [10] 孟子 [G] //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1] 班固. 汉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12] 扬雄. 法言 [G]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载司马光集注本.
- [13] 范曄. 后汉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14] 班固. 典引 [G] // 严可均辑. 全后汉文(卷二六).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15] 四库全书总目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16] 荀悦. 汉纪序 [G] // 明梅鼎祚. 东汉文纪(卷25).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7] 荀悦. 汉纪 [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8] 荀悦. 申鉴 [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9] 刘知幾撰, 浦起龙释. 史通通释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20] 晋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21] 魏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责任编辑: 一 凡]

Wu Xi-qi's Poetics and the New Changes of Zhe School's Poetic Theory in the mid-Qing Dynasty

Liu Huan-ping

Abstract: Qing Dynasty poet Wu Xiqi was a member of Zhe School wh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 Although he didn't have any systematic poetic works, he had written a great deal of verse titles and prefaces as well as journals which illustrated his unique poetic thoughts. In addition, his poetics abandoned Song poetry which was the patent of Zhe School and asserted temperament learning which reversed the "Zong" creative tendency of Zhe School.

Keywords: Wu Xi-qi; Zhe School; poetics; new changes

Mr. Structuralist and the Fantastic

——Rereading *The Fantastic: A Structural Approach to a Literary Genre* by Tzvetan Todorov

Wang La-bao

Abstract: In 1968, when Tzvetan Todorov published *The Fantastic: A Structural Approach to a Literary Genre*, it quickly helped to establish both his personal reputation as Mr. Structuralist and structuralism as the way after New Criticism to deal with literature. Four decades later, Todorov retracted his earlier position through a book of disavowal and repudiation. This article advocates a rereading of the early classic not only for understanding what he thought constituted the central features of fantastic fiction but for laying bare his critical attitude towards it as a genre. Such a rereading, it is contended, would also help uncover problems that had beset all attempts at constructing a structuralist poetics and show Todorov self-consciously wrestling with them from the beginning of his theoretical career.

Keywords: Tzvetan Todorov; the Fantastic; structuralism; disavowal and repudiation

On the Formation of Dual Track Development Patter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Qiao Zhi-zhong Kong Yong-hong

Abstract: The late Western Zhou Dynasty witnessed the birt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hich derived from the official institutionalized recording of historical events, while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saw the thriving of private compiling history which eclipsed its official counterpart in compilation level. In the Qin and Western Han Dynasty when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revealed a trend of decline and stagnation, Si Ma-qian's Historical Records proved to be a huge leap of private compiling history, assuming a trend of highlighting personality and depart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path.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while Emperor Ming supported Ban Gu in compiling the Han Shu on one hand, he also advocated the compiling of Dong Guan Han Ji on the other hand, creating a situation that the authority not only recorded but also compiled history so as to draw the historiography back to the direction of centering around the imperial politics. The Eastern Han authority guided private compiling history rather than block it, in this way constructing the new pattern of the dual track development of the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and private historiography,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of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contributed to the prosperity of Chinese ancient historiography, caused later imitations of ethnic minority regimes with it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harm and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leading factor of the ethnic fusion occurred during the Western & Eastern Jin and Southern & Northern Dynasties and meanwhile produced far-reaching effect in Chinese history.

Keywords: dual track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y;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private historiography; new pattern